央行行长易纲在博鳌亚洲论坛2018年年会“货币政策的正常化”分论坛上表示——

大幅开放金融业 提升国际竞争力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袁 勇

论坛关注

在4月11日举行的博鳌亚洲论坛2018年年会“货币政策的正常化”分论坛上，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表示，对于习近平主席在博鳌亚洲论坛主旨演讲中宣布的中国将大幅放宽包括金融业在内的市场准入等内容，中国人民银行和各金融监管部门正抓紧落实，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部署，大幅度放开金融业对外开放，提升国际竞争力。

金融开放遵循三条原则

易纲说：“下一步，我们将遵循以下三条原则推进金融业对外开放，一是准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原则；二是金融业对外开放将与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和资本项目可兑换进程相互配合，共同推进；三是在开放的同时，要重视防范金融风险，要使金融监管能力与金融开放度相匹配。”

易纲表示，根据习近平主席所说的落实开放措施“宜早不宜迟，宜快不宜慢”的精神，以下金融领域的开放措施将在未来几个月内落实：第一，取消银行和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外资持股比例限制，内外资一视同仁，允许外国银行在我国境内同时设立分行和子行；第二，将证券公司、基金管理公司、期货公司、人身险公司的外资持股比例上限放宽至51%，3年后不再设限；第三，不再要求合资证券公司境内股东至少有一家是证券公司；第四，为进一步完善内地与香港两地股票市场互联互通机制，从5月1日起把互联互通每日额度扩大4倍，即沪股通及深股通每日额度从130亿元人民币调整为520亿元人民币，港股通每日额度从105亿元人民币调整为420亿元人民币；第五，允许符合条件的外国投资者来华经营保险代理业务和保险公估业务；第六，放开外资保险经纪公司经营范围，与中资机构一致。

易纲称，今年年底前还将推出以下措施：第一，鼓励在信托、金融租赁、汽车金融、货币经纪、消费金融等银行业金融领域引入外资；第二，对商业银行新发起设立的金融资产投资公司和理财公司的外资持股比例不设上限；第三，大幅度扩大外资银行业务范围；第四，不再对合资证券公司业务范围单独设限，内外资一致；第五，全面取消外资保险公司设立前需开设2年代表处要求。

“此前宣布的各项开放措施均在顺利推进，我们已经放开了银行卡清算机构和非银行支付机构的市场准入限制，放宽了外资金融服务公司开展信用评级服务的限制，对外商投资征信机构实行国民待遇。”易纲说。

易纲还表示，经中英双方共同努力，目前“沪伦通”准备工作进展顺利，将争取于2018年内开通“沪伦通”。

两轨道利率将逐渐统一

在回答现场提问时，易纲表示，中国将继续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未来基准利率和市场利率将逐步实现两个轨道的统一，市场将会在利率变化中发挥主导作用。“目前中国仍存在一些利率‘双轨制’，一是在存贷款方面仍有基准利率，二是货币市场利率是完全由市场决定的。目前，我们已放开了存贷款利率的限制，商业银行存贷款利率可根据基准利率上浮和下浮，根据商业银行自身情况来决定真正的存贷款利率。最佳的策略就是让这两个轨道的利率逐渐统一。”

金融监管将有哪些变化？“为促进金融业开放相关工作的顺利实施，央行还将做好配套措施，在扩大金融业开放的同时加强金融监管。在放宽外资准入和业务范围的时候，依然要按照相关法规对各类所有制企业进行一视同仁的审慎监管。通过加强金融监管，可以有效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维护金融稳定。”易纲说，“金融业监管的基本框架还是分业监管，各监管机构职责是清晰的。但从过去这些年的经验来看，我们要特别关注跨市场、跨产品、跨机构的风险传染。比如我们的大资管指导意见，目的就是要让银行、证券及保险的资产管理业务都要在同一个规则下竞争，尽量减少监管套利。”

竞争将带来怎样的变化？易纲称，外资机构是否是强有力的竞争者，要看这些机构本身的治理结构等。“在几年之后，我相信中国市场会更具竞争力，金融业的服务能力会进一步提高，会在一个公平竞争的环境里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我们的监管环境也会更好，金融安全程度也会加强。”

如何推动人民币国际化？易纲说：“人民币国际化是个水到渠成、市场驱动的过程。如果企业和金融机构有这种需求，人民币国际化可以节约交易成本、对冲货币错配的风险，我们都乐见其成。但主要还是靠市场驱动，我们要使人民币和美元、日元、欧元等其他货币的竞争是平等的，让企业可自由选择用哪种货币。”

跨境资本流动态势如何？对此，易纲说：“我们希望资本流动平稳，其有利于全球配置资源。从外国投资者角度看，随着中国股票和债券纳入MSCI和彭博指数，外国机构投资者需要配置此类资产，因而需要投资中国股市、债市。与此同时，中国投资者也需要在全球配置资产。目前，中国投资者的全球资产配置比例偏低。随着中国开放度进一步扩大，中国百姓和机构可以更大程度地在全球配置资产。鉴于国内和国外投资者都有需求，跨境资本流动能够保持平稳高效态势。”

图① 4月11日，在“货币政策的正常化”分论坛上，与会嘉宾交流看法。

图② 4月11日，在“税改：‘抢跑’经济的竞争力”分论坛上，与会嘉宾围绕减税潮对全球投资的影响等问题展开讨论。

图③ 4月11日，在“资本市场改革的‘四梁八柱’”分论坛上，论坛嘉宾围绕资本市场改革等问题进行交流。

图④ 4月11日，在“金融的未来：改变还是被改变？”分论坛上，论坛嘉宾围绕互联网金融分享观点。

本报记者 高兴贵摄

完善“四梁八柱” 改革资本市场

本报记者 周 琳

4月11日，中国证监会新闻发言人高莉表示，将沪股通及深股通每日额度分别调整为520亿元人民币，沪港通下的港股通及深港通下的港股通每日额度分别调整为420亿元人民币，我国资本市场改革开放再迈出重要一步。资本市场改革涉及哪些内容？为什么要不断推进资本市场改革？在博鳌亚洲论坛2018年年会上，嘉宾们各抒己见。

“中国人盖房子都要先搭建框架，4根横梁和8根支柱是资本市场改革大框架的生动比喻。”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吴晓求认为，资本市场改革的“四梁八柱”应包括几方面内容：一是股票发行制度改革，二是发行标准改革，三是监管架构改革，四是退市制度、并购重组、信息披露等基础制度的改革。这几方面加起来构成资本市场改革的基本框架。

“监管架构改革对资本市场改革来说很关键。”迪拜金融服务管理局首席执行官伊恩·约翰斯顿认为，从全球视角看，目前涵盖资本市场的金融监管模式很多，对银行、保险、证券的监管有单一的监管模式，有分业监管的模式，还有部分经济体采用“双峰”监管模式。目前看，监管模式本身没有优劣之分，只有是否符合监管实际和本国国情之别。

日本金融厅总务企划局参事官（国际担当）柴田聪认为，目前部分国家采用的是基本涵盖整个金融体系的单一监管模式，这种模式有利于监控全部金融体系的稳健性，不需要做部门协调，可以统一、及时地做出监管反馈，还有利于对金融控股集团的监管，对多牌照金融公司的管理优势明显。

为什么要进行资本市场改革？在吴晓求看来，由于金融风险出现变化，资本市场也将进行相应改革。过去是金融机构风险为主，而目前的市场风险、透明度风险在上升，这就需要金融监管的改革。资本市场在整个金融体系的改革发展中占据重要位置，完善资本市场理所当然。具体来看，一是中国金融改革需要靠资本市场推动，二是中国的未来要构建国际金融中心，建设金融强国少不了资本市场的改革发展，三是中国要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市场上的资产要有很好的成长性，成为人民币计价资产的配置中心，这需要资本市场改革同步推进。

如何进行资本市场改革？悉尼证券交易所CEO托尼·萨克认为，完善资本市场改革要考虑外部因素，包括稳健的经济基本面、稳健的银行体系、强有力的监管环境等，不能盲目冒进，也不应停滞不前。中泰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李迅雷认为，资本市场的改革还离不开技术的支持。例如，利用大数据监控资金账户，查看异常交易信息等。又如，金融科技的应用能贯穿金融业务前中后台及监管，包括用户交互环节、业务逻辑、后台运营、监管科技等4个层面。这有助于资产管理行业更深入地了解用户、控制风险。以百度金融为代表的金融科技公司就能通过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输出应用于金融机构的资管业务场景，为资产管理行业提供新思路。

“除了看得见的制度和法律之外，资本市场改革还应营造良好的证券文化，完善信托责任。”永丰金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翁文祺认为，杜绝资本市场的违法乱纪现象并不能完全靠行政处罚，还要靠市场的力量，最重要的是资讯揭露。这就需要市场的资讯都要保持真实性。如果说“四梁八柱”是看得见的建筑材料，那么资讯揭露和健康的证券文化就是看不见的地基，有了诚信文化，资本市场这座“大厦”才能屹立不倒。

博鳌听潮

让金融为实体经济赋能

牛 瑾

实体经济是金融的根基，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4月11日，在博鳌亚洲论坛2018年年会上，一场思客会围绕实体经济发展与金融力量展开了深度探讨。

实体经济根深蒂固，金融才能枝繁叶茂；金融与实体经济循环通畅，实体经济才会活力四射。实体经济快速发展，金融该如何跟上？要在打好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攻坚战的同时，通过改革与创新，切实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水平。

深化改革，加速金融改革是应有之义。虽然银行等传统金融存款多、信用高，但也存在金融产品单一、金融资源配置不平衡、服务效率低等难题。在新形势下，我国需求结构升级，但供给体系没能跟上，供需出现结构性失衡，导致实体经济循环不畅。金融要更好服务实体经济，必须按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要求，以解决融资难融资贵，特别是中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为抓手，连接供求、组织资源，支持金融机构扩展普惠金融业务，规范发展地方性中小金融机构，助力修复国内经济失衡问题。深化多层次资本市场改革，推动债券、期货市场发展，有序引导新三板在大力促进直接融资、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方面勇担重任，实现为实体经济多元化服务。

要扎根于为实体经济服务，围绕人民群众和实体经济多样化的需求开展金融创新。金融产品创新必须依法合规，不能打着创新的名义到处拉大旗、盲目铺摊子，大搞资金体内循环和脱实向虚，更不能搞金融诈骗。这就意味着对金融监管要实行高标准严要求。随着金融机构混业经营趋势加剧、金融创新产品日益丰富以及金融科技手段的广泛运用，金融风险更富有隐蔽性、复杂性和传染性。金融监管必须在“长牙齿”的同时，兼顾前瞻性、敏锐性。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的成立、一行两会架构的成型，新的金融监管架构瞄准中国金融领域的现实国情，构成了金融体系稳定发展的基础，将切实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水平。

我国将在扩大开放方面，大幅度放宽市场准入，在服务业特别是金融业方面加大开放力度。对金融业和实体经济来说，这是重大利好。放开金融业，让更多外部资本进入中国，有利于实体经济融资；引入先进的金融服务，有利于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推动实体经济发展。更重要的是，随着金融业市场准入的放开，更多重大改革将被撬动，“金融活经济活，金融稳经济稳”将收获更多生动样本。

财政部副部长程丽华：

减税降费，我们下了先手棋

本报记者 李盛丹歌

4月11日，在博鳌亚洲论坛2018年年会“税改：‘抢跑’经济的竞争力”分论坛上，财政部副部长程丽华表示，中国自主降低关税是根据自身发展需要而进行的主动扩大开放举措，我们希望能够同国际社会共同珍惜和维护开放包容的多边体制，实现互利共赢，共创共享发展成果。

程丽华指出，在税制方面，财政部将加强总体设计和配套实施，建立既符合中国国情，又适应国家治理现代化要求，更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税收制度体系，推动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发展，主要有四个方面的考虑：一是进一步优化税制结构。兼顾税收调控和筹集财政收入功能，逐步优化税制结构，推进增值税改革，构建公平简洁的税收制度，分步推进房地产税的立法和实施，建立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度。二是进一步落实税收法定原则。将现行由行政法规规范的税种上升为由法律规范，同时废止有关税收条例。三是积极稳妥推进地方税体系改革。适当下放税权，逐步培育地方主体税种，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四是推动建立国际税收新秩序。继续拓展和深化全球税收治理合作，倡导和推动国际税制协调发展，推动建立公平公正、包容有序的国际税收制度体系。

程丽华表示，面对全球经济形势错综复杂的背景，中国率先实施了一系列重大减税降费改革措施，特别是税制改革、税收立法、减税降费协同推进，解决了许多长期存在的难题，下了先手棋，打了主动仗。

谈到如何继续实施深化增值税改革的措施时，程丽华表示，国务院决定从2018年5月1日开始，继续实施深化增值税改革，主要包括降低增值税税率、统一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标准、进一步扩大留抵退税范围等，预计全年为市场主体减税达到4000亿元人民币。国务院还决定降低政府性收费，清理规范政府性收费的范围不仅包括行政事业性收费和政府性基金项目，还涉及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等方面，再加上清理规范经营服务性涉企收费，全年减轻企业负担大致在3000亿元人民币。